

《中国1946》：历史深处的真相

□ 邓凌艳

谈到1946年，张正隆说，这是一个色彩纷繁、变化多端，像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时期，各种政治势力迅速调整，聚拢力量。抗战胜利后，中国被逼到十字路口，是战争还是和平，是独裁还是民主，平静的局势下酝酿着动荡与变革，1946年之后，一切都变了。“这一年才是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真正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中讲述的河南大饥荒的故事，让人们对70年前那场几乎被人遗忘，但却饿死几百万人、殃及三千万人的灾难有了直观的了解。今天，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人祸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主因。

这个主因在张正隆的新作《中国1946》中找到了全面而真实的记载，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真正背景是著名的、又曾被历史深深地掩埋了真相的“花园口事件”。自然灾害和抗战爆发，并非是造成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最重要原因，蒋介石

一手操控的“以民养兵”的政策才是罪魁祸首。

因此，有网友这样评价张正隆和他的作品：张正隆以朴素的善恶感情，描绘了战争中的人性残酷，打破了一直被恪守的用阶级观点区分战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戒律，对于反人性的做法，他都一视同仁地进行谴责。

在《中国1946》中，张正隆通过采访抗战老兵，翔实参考历史资料，详细生动地叙述了国共双方斗智斗勇的全过程。同时，张正隆又以文学的花生妙笔，对比刻画了诸位风云人物，诸如毛泽东、林彪、蒋介石、马歇尔等等，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把历史人物全方位呈现给读者。

张正隆回忆，写这部作品时，他尽可能多地寻找来自各方的历史资料，从多个方面来证实一个历史事件，例如双十协定、重庆谈判、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等。为了获取客观全面的历史资料，张正隆常常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查阅资料，一坐就是一天，甚至跑到台湾史料档案馆

寻找资料，因为资料不能借阅，他就用相机拍出来，带回家一字一句将有用的东西整理出来。为了接近最真实的历史场景，张正隆曾走遍大半个中国，自费寻访了上百位老兵，从这点来说，采访是带抢救性质的。

历史是一架车轮，不断重演过去和将来。平静时局下暗流涌动，动荡之下酝酿着变革，影响着中国的未来走向，这和现阶段的中国有几分相似，时刻都是在走钢丝的1946年面临的是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安，而68年后的现在面对的同样是走钢丝的国内外局势。

业内专家表示，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当下，中国又一次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张正隆表示，1946年的一些经验在当下依然可取。

《中国1946》
张正隆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新书快递



《影像感染》
[法] 弗兰克·蒂利耶 著
译林出版社

小说在层层案件破解中，对人类暴力本能的思考上升到了超越类型小说限制的高度，在通过影像传播控制人的精神这种极端情形下展现了人的悲惨与罪恶。



《猫鸣》
[日] 沼田真帆香留 著
南海出版公司

本书讲述了一只虎斑猫“小纹”一生中的三段时光。这只仿佛能够看透一切的猫不管是对于饲主夫妇，还是内心孤僻的陌生少年，都像是不可思议的外星生物。而一起生活了20年后，小纹也迎来了它最后的日子……



《新城区战略与路径》
邵自升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本书从新城区的战略定位、策划营销、规划设计、文化、类型等十几个方面构筑了完整的新城区发展路径。

洛杉矶雾霾启示

□ 几又

中国并不是遭受雾霾严重侵袭的第一个国家，历史上的英国伦敦就曾以“雾都”著称于世。按照《洛杉矶雾霾启示录》作者的描述，上世纪四十年代后的洛杉矶，也曾遭受雾霾的严重侵袭，雾霾不仅伤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工作习惯，甚至还“制造”出新的行业。除了最为简单的口罩，还有空气清新机，甚至还有人专门从郊区灌装新鲜空气销往城市。

从时间跨度上看，洛杉矶的雾霾治理耗时极长，从1943年7月26日清晨出现严重雾霾天气，到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经历了整整27年，而到1999年一级污染警报(非常不健康)的天数降为0则长达56年。

当年，人们对雾霾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一开始，科学家们拼命想揪出雾霾“元凶”，然而随着研究逐步深入慢慢发现，工业废气、汽车尾气还有市民焚烧垃圾等都在切实地为制造雾霾天气“贡献力量”。

毫无疑问，治理雾霾，必然将矛头对准工业体系。洛杉矶一开始也面对着污染和发展难以调和的艰难选择。当雾霾突然袭来并逐渐成为生活的常态之时，也正是二战最为关键的时刻。洛杉矶本身有着庞大的军事工业，而当时90亿美元的军工订单无论是对于“拼消耗”的战场，还是渴求经济发展的洛杉矶而言，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公众的频繁施压下，当时官员也曾寄望于关掉几个“污染大户”，以便给个交待，但一次次庄严地许下诺言之后，“老天”并不赏脸——空气质量并未因此出现明显好转。

紧接下来，当政府要求解决汽车尾气污染时，却遭到汽车生产商的强烈抑制。当时的洛杉矶，汽车产能仅次于底特律。汽车生产商顾忌成本的提升从而影响市场销售，本能地予以拒绝。而当政府有意禁止居民后院焚烧废橡胶的陋习时，那些原本极力为雾霾天气走上街头施压政府者，却并未表现出应有的支持……现实就是这样分裂：人们都在抱怨雾霾天气，呼吁政府治理找回蓝天，但很多人又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哪怕只是改变一下先前的坏习惯。

好在人们并没有放弃，毕竟自己也在重重雾霾笼罩之下，除非远离这个城市，否则谁也无法逃避。1946年，环境污染专家塔克提出了减少空气污染23个推荐方案，围绕这些方案，政府开始各个击破。政府的“强硬”不仅体现在向那些为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工业巨头，还体现在改变公众的生活陋习。也就是在这种政府主导和民间呼吁相互作用下，雾霾治理发声越来越大，其影响力终波及政治层面，这也是《清洁空气法案》出台的重要社会背景。

在雾霾方面，我们与当年的洛杉矶大同小异，在科学治理做法上理当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尤其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排它选择问题上。从这层意义上讲，雾霾治理首先是政绩评价导向的改革，这是治霾的真正“龙头”。

《洛杉矶雾霾启示录》
[美] 奇普·雅各布斯 等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纸牌屋》：暗地里的博弈厮杀

□ 潘启彦

据说窥私欲是人类挥之不去的天性。家长里短是人群中永远不会落伍的谈资，而且越是社会名流，他们的隐私就会传播得越快。在人们的视野里，权力运行是神秘的“少数人游戏”，往往只能从“政治剧集”里窥视冰山一角，带有“步步惊心的政界博弈，激烈精彩的权力游戏”色彩的热门美剧《纸牌屋》之所以能走红，或者正是因为满足了这样的心理期待。

比起正义感爆棚的《白宫群英》和理想高远的《新闻编辑室》，《纸牌屋》简直就是一部肮脏龌龊颠覆人类道德伦理的阴暗把戏。然而，用对比的眼光审视该美剧和同名原著小说，还是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小说发生在美国，电视剧的背景则是美国；电视剧更倾向于美国时政，小说则比较完整地展现出身处政治中心的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小说版的《纸牌屋》，以英国唐宁街为背景，作者迈克尔·道布斯通过一个“党鞭”(议会内的“纪律主管”，主要工作是说服党员按照党派规矩投票，按照政党立场行事，以及沟通党内领袖和议员们的关系)——弗朗西斯·厄克特的上位史，将欧美政治

的“屋顶”彻底掀开。从故事情节和幽默语言艺术上说，可与日本作家筒井康隆的《文学部唯野教授》和美国作家伍迪·艾伦的《门萨的烟花》相媲美。

透过这部紧凑得几乎没有半点多余情节的小说，会惊奇地发现，发达国家的政治环境看似透明，但谋权者在其中的真正游戏却是那样不可告人。暗地里的博弈厮杀比明面上的拼搏更为艰难，所付出的代价也更为高昂。如京剧《三岔口》那样，两个武生在黑暗中打斗，试探、碰触、攻击、防守，人们也会为他高效率的行事风格叹服，这某种程度上成为奔波于职场白领们心理共鸣的基础。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弗朗西斯将报社的“菜鸟记者”玛蒂·斯多林追自己要新闻的事情告诉妻子，并和她商议如何利用那个“菜鸟记者”来达到自己通过舆论打击对手的方

法。莫蒂玛明确告知丈夫，可以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征服那个“不经世事”的丫头。牌局之中的家庭关系是如此令人惊异：家庭成员抱定极为一致的目标，为了赢得这局游戏，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官场小说”的文化意义永远大于单纯的文学意义，中外莫不如是。严格意义上来说，迈克尔·道布斯不是一位纯粹的小说家，他的第一身份应该是政客。他1975年步入英国政坛，曾任职英国政府特别顾问和撒切尔政府幕僚长。正因为有特别在政界摸爬滚打的亲身体验，他得以将“官斗”刻画得更为真实、直接和残酷。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信息时代，其实就是大数据的计算或算计。无论论坛、职场还是商场，如同一场纸牌游戏，意欲胜出，不仅要对自己手中的每一张牌心中有数，而且对方手里的牌也要知晓八九不离十。否则，苦心经营的纸牌屋可能因一招不慎而坍塌——这或许正是《纸牌屋》的隐喻意义。

《纸牌屋》
[英] 迈克尔·道布斯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中国视角，韩国政策

□ 金曼荣

《“三农”支援政策及其效果研究》一书，从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业和农村健康发展的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和评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政策，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韩国农业支援政策的效果，并以此为基础指出了韩国的经验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几点启示。

20世纪60年代韩国进入工业化发展的快车道之后，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逐步超越了中国，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新加坡、香港、台湾一道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四

小龙”。中韩建交后，从善如流的中国政府和人民非常关注韩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研究韩国经济发展和中韩经济文化交流的学者也不断涌现。该书便是介绍和研究韩国农业政策的成果之一。

《“三农”支援政策及其效果研究》对韩国农业支援政策的研究并未局限在对韩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政策的介绍和简单评价上，而是基于农业自身的重要性和各时期学者所提出的农业保护理论对其进行定量和定性两方面的分析，这将有助于本书读者更客观地看待韩国的农业支援政

策，更广泛深入地了解韩国相关政策。

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国政府在2006年提出的战略性决策，多年来一直在不断深入推进。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开展的新村运动可以为我国提供一点参考。

在本书中，作者也用了较大的篇幅介绍了韩国的新村运动。因此，该书对中国学者研究韩国农业政策也有价值。

《“三农”支援政策及其效果研究》
王纪孔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速读

圣贤道德教化源远流长

□ 一米 整理

研究中国历史，在外国最出名的，是英国的汤恩比(著名历史学家)。他对中国人佩服，认为中国人真有智慧。这么大的族群，这么大的幅员，这么多的人口，两千多年，从秦始皇统一开始，一直到今天还是统一，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国家。罗马统一欧洲一千多年，亡国之后，欧洲再也不能统一。所以他曾经跟池田大作(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佛教哲学家、教育家)谈过这个问题，他们理想当中，这个世界要想消灭战争，只有一个办法，是使整个地球人类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汤恩比说，怎样来统一？只有具备中国传统智慧的族群，才有资格统一全世界。因为中华民族有两千多年统一的经验，统一的智慧，统一的方法，有统一的效果摆在面前，哪个国家都做不到。中国靠什么？就是靠这四样东西，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四样东西走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族群，乃至不同宗教信仰的，都欢喜，没有人反对。这四样东西是性德。人都有本性，都有良心，良心里头本来有的东西，它能行得通。

孔子集大成，就是把古老的传说用文字记载流传给后世，所以我们相信《论语》里面许多话不是孔子说的。孔子讲，他一生“述而不作”。“述”是孔子指出他自己所说的属于古圣先贤，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创造，没有发明。“信而好古”，是对古代的文化以及传说，他相信，他喜欢。所以，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绝不是他那个时候才有的。

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是常道，永远不能变更的，这是道。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四维是礼、义、廉、耻。八德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特色、中国文化的精神，一直发展到现在。

《四库全书》是乾隆时代编的，这个典籍世世代代累积下来，你去看，无论看哪一个人的著书，都离不开这个原则。所以我们用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把中国传统文化自古至今全部概括了，没有能超过其外的。

到汉朝，佛法传到中国来了，这不是本土文化，中国人心量大，能包容，能把佛法跟自己本土文化融合成一体。就像汤恩比的话一样，佛法丰富了中国本土的文化，把境界向上提升了。佛法就变成中国文化。

古圣先贤教化的“三样”

中国古圣先贤教化人民就用三样东西。第一个，祠堂。祠堂教什么？教孝、教孝悌忠信。第二个，文庙、孔庙。孔庙教什么？教仁义道德。第三个是城隍庙，你看在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都有。城隍庙教因果教育，给你讲因果报应，你杀众生，众生要向你要索命。你欠人的钱、夺取别人的财产，你一定要还债。一饮一啄，丝毫不爽。你敢做吗？所以，中国这五千年来的这个社会，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幅员，长治久安，靠什么？就靠圣贤的教育。儒家是圣贤教育，佛跟道也是圣贤教育。

我记得2006年在巴黎，在联合国主办活动，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张先生两次请我吃饭，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佛跟道是宗教，儒算不算宗教？我当时回答他，儒释道都不是宗教，清朝末期，翻译外国书时，才翻译成宗教，以前没有这样的称呼。儒释道三家，也有称三教，但那个内涵是教学、教化，三家的教化、三家的教学，没有现在“宗教”这个名词的含义。

汤恩比的断言

汤恩比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超过我们现在

一般人，中国人自己不认识，外国人认识。而且他说出这种话，“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是不是真的？如果你对这两样东西真的深入研究，你就知道他说的话一点都不错。问题是，现在一般人认识，你跟他讲他也听不懂。专门研究汉学的人也不懂，这让我们非常失望。我说，汤恩比没有说错，我们把他的话解读错了。

怎么解读错了？今天提到孔孟，你们头脑马上就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讲到大乘，一定就想到《华严》《法华》《般若》这些大经大论。你们反馈回应的，是孔孟的因果，是佛法里的花果，很好看，那个东西里头太高深了，谁懂？包括我们一生研究的，都未必能理解里面的奥秘，怎么能帮助社会？花果从哪来的？枝干长出来的，枝干从哪里长出来？根本长出来的，它有根，根是活的。我说，孔孟的根你们知不知道？大乘的根晓不晓得？孔孟的根是什么？《弟子规》。道家的根，《太上感应篇》。大乘的根，《十善业道》。儒释道这三个根的教育要是能够普遍推行，社会马上过去。要多长的时间？我们真做了实验，去我们在安徽庐江汤池作实验，三个月，社会风气完全变了，你们自己都不敢相信，人民是这样好教的。

这个实验证明了两桩事情：第一，“人之初，性本善”；第二，人民是非常好教的，只是你没教他，你要教他，很快他就会觉悟，他就有智慧能够辨别善恶、辨别是非。所以中国是什么社会？读圣贤书之后你就晓得，中国传统的立国制度是圣贤的制度，圣贤的社会，圣贤的政府，中华民族是崇尚圣贤的民族，你不能不佩服。

中国历代的帝王必须念及人民。如果这个皇帝只想到自己，不想到人民，这个国马上就要亡。你看每一个朝代末代的皇帝就犯了个错误。开国的帝王立下来的法都很好，他不遵



守法，他就亡国，他要世世代代遵守，他的国家决定不会亡，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如此。

上下争利，地球危矣

清朝亡国之后到近代，近代整个世界的社会不谈教育了，把经济放在第一、财富放在第一，所有一切都是为财富、为经济服务，教育也变成经济、财富服务。孟子讲得好，利是人之必争。把利摆在第一，一切为利服务，这是西洋人的文化。为利益而竞争，竞争再提升就是斗争，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这是一条毁灭的道路。只有教育则是生路。你看孟子见梁惠王，“上下交征利，国危矣”。“上”是君王，“下”是人民。大家都争利，这个国家就危险了。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地球上，哪一个国家不争利？哪一个国家不是把利摆在第一？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有志之士，科学家跟哲学家提出警告，如果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这样无限制地发展下去，世界最后是要毁灭的。这个话是真的，上下交征利，地球危矣，这还不单是国家危矣，是整个地球人类危矣。

《道德教育》
净空法师口述 王海峰 施景培/编
团结出版社

中国人有智慧

中国人讲“道德”，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的运行称之为道，随顺大自然称之为德。中国古代历史上记载，三皇的时代是以道治天下，五帝的时代是以德治天下。尧舜禹可谓以德治天下，到史称“三王”的夏商周三代，两千多年。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八百年，这一段时期是以仁治天下。春秋战国，中国出现乱世五百年，仁失掉了，这些霸主讲义，以义治天下。秦汉统一中国之后，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用孔孟学说教化全国人民，以礼治天下。这个制度制定之后，一直到满清，两千多年，也有过相对长久的安定。满清亡国到现在，这一百年，礼没有了。古人说的“道、德、仁、义、礼”，礼要失掉了，社会就乱了。如何能够叫社会恢复安定？只有找老祖宗，老祖宗的老办法有效果。